

引言：中国中土汉传佛教建筑史的大略分期

一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的三个阶段

1. 前期

如果将中国中土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大略地分为前期、中期与后期，那么，10 世纪之前的中土汉传佛教，属于其发展的前期。这是一个中土佛教寺院及其建筑从无到有，逐渐弘传流布，滋生发展，并渐渐呈现出繁荣昌盛景象的时期。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中土佛教就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则在其后的隋唐两代，中土佛教进一步的弘扬传播，达到了汉传佛教寺院及建筑最为鼎盛的时期。

从一般的历史分期来看，佛教史上的五代时期，上承晚唐武宗会昌灭法的沉重打击，似乎也可以纳入经历了隋唐鼎盛期之后的这一余绪之中。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短暂的转折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且因这一时期佛教所处的低迷状态，本书将其作为中土佛教发展前期与中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并在行文中，将其放在本书的中卷。

中土佛教史上，从东汉初年到唐末的这一整个前期阶段（67—907），延续了大约 900 年之久。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土汉传佛教的“初传与鼎盛”期。

2. 中期

唐末五代数十年战乱频仍，无论对于社会发展，还是对于佛教及其建筑发展而言，都是一个灾难性的阶段。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佛教本身，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可以说，自五代之后，中土佛教及其建筑，开始转入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的佛教，经历了唐武宗、周世宗的先后打压与五代战乱的戕害，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已难再有佛教初传至鼎盛时期那种具有创造性和喷涌性的勃勃生机。

但是，借了隋唐时期佛教发展鼎盛状态的余波，到两宋、辽金时期，随着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文化得以复兴，这一时期的佛教及其建筑，充满了在经历磨难之后悄然复苏的生命与活力。两宋、辽金时期建造了许多重要的寺院塔阁。佛寺的规模，尽管难以与隋唐大寺院同日而语，却也比后来明清时期的要宏大许多。寺院的空间配置出现定型化的趋势，寺内各种建筑类型渐趋明确，建筑制度渐趋完善。佛教在世俗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参与佛教寺院营造的活力，也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从而在许多看似十分偏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大小不等的寺院。所以，大略可以将从唐王朝灭亡，及北宋王朝建立，直至南宋王朝灭亡（907—1279）的这一整个时期，看作中土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中期（约 370）；这一时期也是现存古代佛教建筑遗迹比较丰富的时期，其中包含了两宋、辽、金和元初的大量佛寺与塔幢。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

中土汉传佛教“重创与复苏”期。

3. 后期

然后,横扫中土大地的蒙古铁骑,无疑对中土的城市、建筑,包括佛寺、道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摧残与损毁。统一中土大地之后的元统治者,对于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从而对佛教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宋元之交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发展;又在元明之交和明清之交重演寺院及其建筑先是被战争摧残,再缓慢复苏,这几乎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汹涌波涛之中,中国佛教及其建筑,忽然败落、萧条,忽然又复苏、振兴。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上下浮动,左右摇摆着。宏伟的寺院建造起来,又遭焚毁,华丽高大的台殿楼阁,今日尚赫然在目,明日又忽然变成一堆废墟。中土佛教建筑发展的晚期阶段,就处于这样一种起起落落的状态之中。

然而,无论如何,明清两代数百年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成为这一历史发展大时段中的主要部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土汉传佛教及其建筑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与促进作用。因此,可以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三个王朝:元代、明代和清代(1271—1911),作为中国中土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

中国汉传佛教史上这一后期阶段,是我们所熟悉的大量尚存元、明、清佛教寺院与塔阁的建造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佛教寺院及其建筑走向了紧凑化、程式化、规制化,寺院的规模与建筑的尺度大不及前。然而,这也正是今日所习见的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空间格局与建筑样态,从而也是汉传佛教及其建筑经历了近 1300 年起起落落的发展之后的一个几乎必然性的结果。古代佛教建筑史上中土汉传佛教建筑发展的这一后期阶段(1271—1911),大约持续 600 年的时间。

二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前期——初传与鼎盛

从佛教史与佛教建筑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前期,即汉魏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亦即 10 世纪初之前的这一整个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细分的阶段。

1. 佛教初传时期

若从公元之初的东汉明帝永平求法算起,则可以将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遣使赴西域求法,开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直至十六国时高僧释道安的圆寂(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以及天竺僧人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后秦弘始三年,401)开始他的译经活动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前期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经历了从东汉初到西晋末近两个半世纪缓慢而沉寂的积淀性过程。到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前期,作为当时中国佛教中心的西晋都城洛阳,建造有佛寺 42 座。永嘉之乱,在北方导致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帝都短暂地西移至长安,旋即又南移至建康,使佛教的中心有了大的迁移;

其二是北方发生的五胡乱华与十六国纷争，既导致了另外一个佛教中心——邺都的出现，也导致了佛教在动荡局势下迸发性的发展。在西晋末到十六国晚期，仅“西晋二京”——洛阳与长安的佛寺就达到了180所之多。而在天竺僧人佛图澄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与影响下，到4世纪中叶时，仅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佛寺，就达到893所之多。

如果将西域僧人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作为一个标志，那么，中国佛教史及佛教建筑史前期的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大约有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漫长历史阶段。如果再上溯至史籍中记载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算起，大约为400年的时间。这一阶段可称作是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

2. 南北朝时期

中国佛教及其建筑发展前期的第二个阶段可以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的5世纪初（401）算起，这一时期的北方已经接近十六国的尾声，随之而来的南北朝，经历了佛教及其建筑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一阶段经历了南北朝对峙，直至隋代统一（581），前后大约180年时间。

3. 隋唐时期

自隋唐至五代数百年时间（隋开皇元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581—907），可以看作中国佛教及其建筑发展前期的第三个阶段，由于隋代文、炀二帝的大力提倡，加之唐高宗，特别是武则天的扶植与推动，同时借助了盛唐与中唐时期百余年相对安定与繁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这一时期的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到了它的鼎盛阶段，不仅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也出现了佛教十三宗并峙的繁盛景象，并渐渐呈现出了由盛而衰的转折迹象。这一阶段大约经历了380年的时间。

三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中期——重创与复苏

自10世纪初开始的中土汉传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很难简单地按照时段来划分。因为这是一个战乱的，同时也是分裂的时代。五代数十年战乱，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随之而来的北宋统一，其实也只是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峙的是北方的辽，以及后来的西夏。12世纪初金人兴起，取代辽人，延续了这一南北对峙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到13世纪后半叶蒙元铁骑如疾风扫落叶般横扫中华大地，国家才真正再一次回到了如隋唐时期的统一大帝格局。

1. 五代十国时期

从唐帝国灭亡的907年到北宋统一的960年，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仅有短短的50余年，但其在佛教史上也颇有声色，尽管中原地区的佛教与寺院遭到了重创，寺院凋零，僧团散落，但在相对比较平稳的江南吴越、南唐、闽，湖湘、岭南的南汉，以及前蜀、后蜀所统治的地区，佛教及其寺院反而

呈现了各具特点、特立独行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两宋佛教及其寺院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辽、金与西夏时期

尽管由于金与元代铁骑的扫荡,辽代的历史文献残存无几,但是辽代佛教寺院建筑却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葩。辽代佛教木构建筑保存的数量、类型及其完整性,在中古时期佛教史上,几乎是最好的。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金代也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建筑遗存,而金代文献中所记录的辽、金两代的寺院情况,也为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代提供了可能。

偏居西北一隅的西夏,在蒙古人的扫荡下,其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却也保留了部分文献与寺院遗迹。现代的西夏研究,使对这个神秘王国的佛教建筑可以有一点粗略的了解。

3.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始自 960 年, 终至 1279 年, 前后大约 300 年的时间, 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在文化与经济上, 两宋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从文献上看, 尽管寺院的规模、寺院建筑的尺度、佛教的内部宗派及不同宗派的僧团规模都远不能与隋唐两代同日而语, 但是, 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两宋时期的佛教及其建筑, 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是寺院的建造数量, 寺院分布的范围, 普通民众参与佛教寺院创建的热情, 以及寺院中建筑类型的多样化, 单体建筑造型的丰富与华美, 甚至殿堂内部小木作装饰, 如经藏、藻井、彩绘等方面的繁缛细密, 都达到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

四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后期——衰落与复兴

1. 元明时期

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的滚滚烟尘, 在 13 世纪后半叶, 渐渐趋于平淡, 元帝国的建立, 结束了中土大地数百年分裂与对峙的局面。然而, 金末元初, 或宋末元初, 以及后来的元末明初的战争, 其惨烈的程度, 已经远比唐末五代时期为剧。对于城市与建筑的摧残也是十分巨大的。元代, 以及明代统治者, 在抚平了战争的创伤之后, 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与宗教的延续, 这使得元、明两代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得以恢复、延续与发展。

有明一代还是一个制度恢复的时代, 统治者希望将其社会与文化恢复到唐宋盛期的状态, 这反而促进了其制度重建的过程。城市中的坛壝、祠庙、城隍等中央与地方信仰, 都被纳入了不同等级城市的重建过程。明代的佛教寺院也大约经历了这一相同的复兴过程。

客观地说, 除了明代城市之外, 明代的佛教寺院及建筑, 也都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晚期的一个重要奠基性程式。寺院格局上的定型与完善, 建筑类型上的简约化, 以及寺院空间的紧凑化, 殿阁造型上的程式化与地方化, 这一系列转折性发展, 也使明代及清代的寺院和建筑, 与其前唐、宋、

辽、金、元诸代的寺院及其建筑，有了许多明显的区别。

2. 清初至康雍乾时期

明末清初的战争，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宋元之交与元明之交，特别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崛起但却未能最终获得政权的个别亡命之徒，如张献忠之流，在其流窜于各地的垂死挣扎中，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摧残，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其屠刀所及处的佛寺道观也未幸免。

清代初年至康雍乾时期，是一个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佛教及其建筑也得到了逐渐恢复与发展。而清代统治者在信仰上，有崇尚藏传佛教的传统，也使藏传佛教在中土弘传，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互影响，并在寺院上的相互融合，创造了一些规模恢宏的汉藏式寺院。清代最重要的皇家寺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具有浓郁汉式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而这种汉藏结合的寺院格局与建筑造型，也为中原地区的佛教寺院带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

3. 清代中晚期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兵火的摧残、蹂躏，以及天灾、人祸的袭击，经历过无数次社会由平稳到动荡，再由动荡到平稳的大起大落，一次次成为废墟，变成后人唏嘘叹息的荒草残阶，之后又经历数年的募缘重建或重修，渐渐恢复起一座寺院的大致样貌，这就是历代中国佛教寺院，特别是元、明、清时期佛教寺院建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古老而著名的佛教寺院，其寺内的建筑价值，却远不及那些偏僻乡野地区寺院中的建筑更为古老、更为珍贵的主要原因。

现存的大多数寺院，及寺院中的大多数建筑遗构，大约都是清代中晚期的留存。经历了康雍乾盛世之后，清代社会也开始渐渐变得迟滞、呆板、腐败而缺乏生气，经济上与文化上的活力与动力，也似乎不及清代早期所具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生机。太平天国点燃的农民战争，与明末农民战争一样，对于城市与寺院，除了摧残、破坏与毁灭之外，难见有什么建设性的推动。年久失修的寺院殿阁，在民间力量的促动下，得以勉强维持与修复。寺院建筑的大致格局，在香客们烟云缭绕不断的香火中，得以延续或重建。但其重建或重修的寺院却再也难现隋唐之宏大、宋金之繁丽，更难见元代寺院及其建筑的放浪不羁与不拘一格，亦不见明代建筑的端庄、凝重，甚至难见清初建筑的严整、规范。

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到清末时期，也走到了一个几乎是穷途末路的衰败期，其寺院格局显得僵化、建筑制度略嫌简陋，甚至诸多名山巨寺内的殿阁楼堂，其建筑结构之简陋与造型之粗鄙，与村夫俗妇们集资而建的偏僻祠寺，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这或许就是在今日所能够见到的许多所谓名山大寺中，不时感觉到的那种建筑的凋零、简陋与粗鄙，从而令人颇感失落的大致原因。

当然，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从而也进入了一个佛教复兴与寺院建筑保护、修缮与重建的高潮期。然而，这已经不是本书讨论的话题了。

五 本书对汉传佛教发展三个阶段的关注重点

1) 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重点放在中国中土汉传佛教发展前期,即佛教从初传到鼎盛的时期。其初传时期,是从东汉初年到西晋末至十六国时期佛寺的流布与寺院建筑空间形态的萌发上。限于实例的缺乏,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对这一时期佛教建筑之分布与早期寺院空间特征的梳理分析上。而这一阶段中土汉传佛教的中心,主要是在北方地区。这是一个汉传佛教与佛寺建筑刚刚进入传播、流布与生长过程的朦朦胧胧的萌芽性阶段。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可以将释道安辞世的4世纪末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的5世纪初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前期第一与第二这两个阶段之间划分的一个大致分野。

其实,随着西晋王朝的彻底覆灭,以及因“衣冠南渡”而引起的经济与文化的南移,使得东晋首都建康成为另外一个佛教中心。因此,南方地区的佛教发展,还应该从5世纪初向前追溯。自东晋王朝建立,乃至一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近300年时间,是中国南方佛教及其建筑生机勃勃的重要时期。而继十六国与东晋而起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及其建筑在中国佛教史与佛教建筑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样评价也不为过的。当然,这一时期需要专门的章节来加以整理与论述。

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是隋唐两代。隋唐统治者在政策上的一系列推波助澜的做法,以及中土僧人与西域、天竺僧人密切的交流互动与往来,特别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使隋唐时期的中土汉传佛教,达到了其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中国汉传佛教地区,基本上可以称作一个佛教社会,佛教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2)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叙述比较困难,五代时期的割据状态,使我们只能大致厘清其粗略的寺院建造线索。而辽、金两代,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以有限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典型寺院可能的空间格局进行的探究上,以及对辽金时期较为丰富的寺院建筑遗存展开的叙述上。使人在这些似乎断断续续的描述与分析中,理出一个辽、金时期佛教寺院建造的大致轮廓和寺院空间格局的粗略印象。西夏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则更有赖于当代西夏学者的研究及有限的建筑遗存,使人能对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与特殊区域的佛教建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两宋时期是历史文献极其丰富的时代,要从海量的文献中,梳理出一条较为明确的寺院建造与寺院建筑格局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爬梳、整理,至少使人们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究竟建造了多少寺院,这些寺院中都有怎样一些各不相同的,与其前及其后的寺院建筑大相径庭的建筑类型。以及,这一时期的寺院空间,是怎样从大规模、多子院的隋唐式寺院,逐渐过渡到一个空间比较紧凑、建筑类型比较完整、寺院功能比较齐全的宋代寺院布局的,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初步厘清两宋时期寺院建筑的基本空间格局。这或许对理解现存明清寺院的空间格局,具有某种追根溯源性的价值与意义。

3) 第三个阶段

将元、明两代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两者都经历了从战争时期

的摧残、破坏,到和平时期的恢复、重建的过程。元代国祚较短,其北方地区,在寺院及其建筑的原创性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活力,也创造了一些值得探究的重要寺院与建筑案例。元代南方地区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发展,与其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如说是两宋寺院的延续与发展。

中土汉传佛教建筑,本来就有很强的传承性与延续性。宋末元初的战争,似乎并没有阻止住江南、鄂湘及岭南地区寺院建筑的建造步伐。元初南方地区的寺院,大多是对南宋寺院的修葺与重建。其基本的格局与做法,几乎与南宋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

明代是一个制度重建的时期。在寺院的等级设定、寺院建筑的格局及寺内建筑的造型上,都有一个全新的建构与发展。因此,明代是中国古代汉传佛教建筑后期发展与定型的奠基阶段。明清两代基本的寺院空间格局与建筑制度,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的。

明末清初的战争,对于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的摧残蹂躏,丝毫不亚于其前历次改朝换代所造成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晚期阶段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战火,也造成了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在整体上的衰败与没落。除了清代皇家寺院在与其所青睐的藏传佛教的相互融合中,表现出了某种如回光返照般的勃勃生机之外,清代一般汉传佛教寺院似乎缺乏了创新的动力,无论是在寺院建筑的空间配置上,还是在寺内建筑的结构与造型创造上,清代的一般寺院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传承、沿袭和保持了明代既有的做法与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发展。

第一章 佛教初传与汉晋、十六国时期佛寺的建造与流布

一 从佛教初传至西晋时期的佛寺分布

1. 佛教初入中土

在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举的有关佛教东传中国之时间的种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似乎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其一是,《三国志·魏志》中的裴松之注中,在谈到天竺国浮屠时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①“元寿”为西汉末哀帝年号。元寿元年为公元前2年。其二是,东汉明帝(图1-1)永平年中遣使西域求法。这一说法见于正史的记载,据《后汉书》:

①文献[2]. [晋]陈寿. 三国志. 卷三十. 魏书三十. 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546.



图 1-1 汉明帝像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①

前一种说法,或可以以《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记载的襄阳习凿齿与道安致书中所曰“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②之语推测,以道安生活的时代,略近4世纪末(据《高僧传》,道安故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即385年),由此或可推知,道安同时代人似乎更相信西汉哀帝时佛教传入的说法。

后一种说法,亦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为北魏太和中人,晚于释道安近一个世纪,《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时代虽略早于郦道元,但去道安生活的时代亦有半个世纪之久。说明到了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时,人们已经无法得知佛法传入东土的准确时间了。

这后一种说法更确切的来源是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其经序中提到了: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③

据梁《高僧传》,汉明帝时来到中土的天竺僧人摄摩腾(图1-2)最早译出了其中的一卷。又说是与摄摩腾同来中土的竺法兰(图1-3)所译。竺法兰译出了五部佛经,“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④。在《后汉书》写作的年代,《四十二章经》当已经在中土流传,故《后汉书》中的记载很可能来自《四十二章经》经传中的说法。

①文献[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1195.

②文献[2].[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经本:54.

③文献[2].[南北朝]迦叶摩腾.四十二章经.大正新修大藏经本:1.

④文献[2].[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本:1.



汉摄摩腾尊者

图 1-2 摄摩腾像

(来源:袁子耀.清刻佛教艺术图像[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汉竺法蘭尊者

图 1-3 竺法兰像

(来源:袁子耀.清刻佛教艺术图像[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文献[2].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 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563.

《后汉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一则较早的佛教事迹, 见于楚王英的传记: “英少时好游侠, 交通宾客, 晚节更喜黄老, 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① 楚王英是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之国为王的, 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因造作图讖被废后自杀。其时代与明帝求法的时代大致还是接近的。这多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面提到的两种说法: 明帝求法说, 甚至哀帝时大月氏王使授浮屠经说, 在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

汉明帝与楚王英的故事, 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初传的两个最早的基地: 一个是东汉首都洛阳, 这里是西来僧人会聚之地, 甚至还可以包括西来僧人去洛阳时必经的西汉旧都长安; 另外一个则是江苏的彭城(今徐州)、广陵(今扬州)至丹阳一线。楚王英所领的藩地, 初在彭城, 后益其土于临淮的取虑(沿睢水, 并接泗水)、须昌二县, 遭废后又徙至丹阳, 这三个地方, 大约是在经由泗水、睢水、淮水及秦汉时所称的邗沟, 直至长江的一条水道上。三国时最早建造中国式佛塔的笮融, 就是活动在这条彭城至广陵的水道漕运线上的。因而, 这条漕运线很可能是最早的佛教弘传路线之一(图 1-4)。



图 1-4 东汉至三国时期佛教传布路线

(来源: 作者改绘自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